

空间、人物与历史记忆

——村上春树《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的异质性书写及其疗愈性

徐谷芄

摘要 长篇小说《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是日本村上春树文学生涯中对异质性书写的深化与总括。作品中的异质性由空间、人物、历史记忆三个维度构成，具有完整体系。小说构建了一个以系统性缺失（无影子、无书籍、无时间）为规则，以一堵拥有主体性与生命力的高墙为规训的小城空间，同时塑造了幽灵、读梦人、超能少年等一系列异质存在者。在“读梦”这一显性的个人疗愈故事下，潜藏着战争、历史以及罪责继承的隐性进程，与村上春树在自传体随笔《弃猫》中披露的家族战争记忆形成互文，共同将异质性从形式创新升华为历史认知这一对宏大异质物的直面与承载。村上文学的异质性，也因之从早期的风格化标识演变为一种处理个体与集体记忆的方法论。

关键词 村上春树；《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弃猫》；疗愈

中图分类号 I313.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5-0024-08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4SJZD095)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在其文学生涯中，致力于思考现代社会中那些无法被常规叙事整合的边缘地带与断裂瞬间，他的文学从诞生之初便以鲜明的异质性区别于日本传统文学^[1](P120)。2023年，在他推出的长篇新作《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以下简称《小城》)中，异质性已从风格化标识演变为一套结构严谨、意蕴深邃的叙事体系。这部作品源自他1980年发表但自认不够成熟的同名短篇小说《小城，及其不确定的墙》(『街と、その不確かな壁』)^[2](P21)。时隔40年，2020年初71岁的村上春树再次对这部作品彻底改写，三年后终于完成了这一历时多年的创作回眸。

小说讲述了一个穿梭于现实与异界之间的故事，由三个部分交织而成。

第一部分，主人公是一位17岁的少年“我”，通过一位名为“你”的少女，知晓了一座被高墙环绕的神秘小城。那里的居民没有影子，图书馆没有书，钟楼的大钟没有指针。后来，“我”真正进入了这座小城，成为图书馆的“读梦人”，负责解读那些被密封的、被称为“旧梦”的内心创伤，而“我”的影子则不甘被困，策划了一场逃离，“我”却选择留在城内。

第二部分，时间跳转到“我”45岁时。此时“我”已从小城的长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世界，成为一个孤独的东京上班族。不久，“我”辞去工作，来到福岛县一个偏远小镇——Z镇的图书馆担任新馆长。在这里，“我”结识了两位奇特人物：一位是行为古怪、身穿裙子的前任馆长子易先生，后来“我”震惊地发现他其实是一年多前就已去世的幽灵；另一位是身穿黄色潜水艇图案的夹克、患有学者综合征的少年。当“我”向少年讲述小城的故事之后，少年不告而别，决心去寻找那座城。

第三部分，“我”再次回到那座超现实的小城，遇见了已成为城内居民的“黄色潜水艇少年”。为了实现成为“读梦人”的愿望，少年请求与“我”合为一体，共同完成解读“旧梦”的工作。最终，少年继承了“我”的职责，而“我”则与自己的影子重新合一，如同飞鸟般越过高墙，离开了小城。整部小说便在主人

公的这次告别中结束,完成了一场关于记忆、创伤与自我审视的漫长旅程。

从叙事结构来看,作品的异质性内含一个由表及里、环环相扣的三重构造:第一重是空间的异质性,它通过无影子、无书籍、无时间这一套系统性缺失的规则以及拟人化的墙,构建了一个质疑现代性的隐喻舞台;第二重是人物的异质性,幽灵、读梦人、超能少年等角色,作为被主流秩序排斥的异质物,共同执行心理疗愈的功能;第三重是历史意识的异质性,它以“读梦”为纽带,将个人的疗愈与对日本二战后历史的反思衔接在一起。

王守仁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和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指出,外国文学及其研究中的异质性,包括性质上的差异,植根于异质性的社会实践土壤,交织于异质性的文化语境网络以及用异质性的语言书写等多重内涵^[3](P12)。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叙事策略与风格的差异上,也通过深层的意识转换,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了独特影响。《小城》的异质性书写是多重异质维度交织的典型。例如小城的设置,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认知,人物塑造也超越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常态范畴,历史记忆的书写则解构了线性时间观。这些异质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系统性缺失的规则设定与双重叙事进程的编排策略,在作品内部形成自洽的符号逻辑,最终指向对战争创伤、集体记忆与个体伦理的深层叩问。针对此,本文先剖析《小城》的异质性构造空间和人物的异质性谱系,然后讨论村上春树如何通过作品直面历史记忆及其责任,以此揭示村上文学的异质性叙事在应对社会与时代难题时的内在变化与深入思考。

一、“小城”的异质性空间构型

《小城》的异质性叙事,突出地体现在作者描绘了一个奇异的空间——小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提出异托邦的概念,认为它们是嵌入和写入社会体制内的真实空间,为了实现文化、历史与社会功能,抗议甚至颠倒常规空间的秩序和法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提出疑问和展开抗争^[4](P132)。村上春树笔下的小城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学异托邦,其异质性反映在清晰且彼此支撑的规则之上:无影、无书与无时。三重系统性缺失,把小城打造成一个现代性认同完全被悬置的空间。

在第一部中,主人公初次踏入这座小城时,便察觉到了一个奇特现象:“野兽们是有影子的。其他任何东西都带着影子。不带影子的,就只有人了。”^[5](P81)所谓无影,并非自然缺失,而是小城空间对个人的强制性规训。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构建现代身份认同时,专注于第一人称的、主观的、自我肯定的身份认同,将现代主体发展为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6](P120)。影子作为人的内在价值的外在象征,在这种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小城所定的无影法则,却切断了这一过程,似乎没有否定人的内在性,然而通过强制,使个人的内在性无法获得外在的表达与公共的确认。无影使城里的居民化作幽灵般的存在,虽能保持自我,却难以成为可被完整辨识的个体。

小城的图书馆,是一座毫无特征的石造老建筑,然而“书库里,取代书籍的,是成行排列着的无数的‘旧梦’……图书馆里没有放一本书——连一本也没有”^[5](P25)。书籍的缺席与“旧梦”的取而代之,象征着启蒙运动以来建构的公共理性知识谱系与线性历史叙事失效。图书馆作为陈列公共知识、连接历史的空间,被异化为收藏私密、断裂、情感化“旧梦”的容器。这意味着小城空间从客观、累积的理性认知,转向了对主观以及不可言说的经验残余物的封存与管理。

在小城的中央广场,“有一座很高的大钟楼,但没有指针”^[5](P5)。无指针的钟楼,宣告了线性时间这一现代性进步叙事的框架在小城出现了崩塌。按照村上春树的描述,“时钟一如既往,没有指针。那不是告诉人们时间的时钟,而是告诉人们时间没有意义的时钟。时间并没有停止,但是失去了意义。”^[5](P457)在这个线性时间观瓦解的时空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推进,一切都被冻结在当下,社会或个体不再处于一个发展的叙事中。这种无时性正是福柯所论异托邦的体现,不再是思想史所主张的时间的线性和单向方式,而是预示着一个由点线连接编织而成的网络空间^[4](P131)。

村上春树描绘一个没有影子、没有书籍、没有时间流转的小城,从根本上挑战了现代社会赖以运行的几个核心观念:人对自我独特性的认知、历史被理性记载和传承、时间必然线性向前、社会不断进步等。因而小城也就成了一个文学上的特殊空间,一个专门用来安置和处理那些不符合常规、难以被主流社会接纳的个人经验和记忆的场所。这样一个由众多缺失所定义的空间,是如何保持独特性而不被外界常规侵蚀呢?在这里,那道“拥有自己的意志,拥有独立的生命力,并且亲自牢牢地围护着小城”的墙^[5](P338),成为理解小城异质性得以存续的决定性因素。小说的这道墙并非静态的边界,而是空间法则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是异托邦的主权象征和规训的装置。在村上春树笔下,墙的核心功能是执行空间交换的绝对命令:“进城的人不能携带影子,出城的人必须携带影子。”^[5](P79)它意味着,进入小城这一异质领域时,必须放弃构成常规自我认同的标志物亦即影子;而若要离开,则必须携带此异质世界的烙印。不能不说,墙的设计符合福柯描述的异托邦的特性,它拥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既将人隔离,又使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进入,整个空间既有开放性也有排他性^[7](P11)。

村上春树别具一格的异质性叙事,在于他赋予了墙以主体性与生命力。墙可以自行移动、言说、阻截,从一个被动的障碍物,升格为主动的维护者与规训者。这与村上春树在1985年问世的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那墙壁所暗示的,我想肯定是被框定的人生”这一较为静止、代表既定命运的极高的墙形成强烈反差^[8](P187)。《小城》中墙的拟人化,暗示了它已成为一种具有自主意志、自动运作的掌控机制。按照墙自己的话来说,“你们根本就穿不过墙……想跑多远就跑多远好了,我永远会在那里等着你”^[5](P127)。它隔开了内外空间,又深层次地塑造着个人的记忆与认知。2009年,村上春树在《高墙与鸡蛋》的演讲中以高墙为喻,探讨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指出墙虽然高大坚固,但其中每个灵魂皆独一无二,相信灵魂间的融合能够产生温暖^[9](P57)。《小城》中的墙,正是这一意象在文学叙事中的体现。从1985年到2023年,村上春树笔下的墙一步步进化。不过,《小城》的叙事没有因为墙的存在而陷入二元对立中,村上春树运用了一套镜像叙事策略,在墙的内与外开辟了一条相互渗透的通道。

小城无指针的钟楼,在小说第二部描述的Z镇这一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对应,它就是子易先生那块“有数字,却没有指针”的手表^[5](P205)。这一镜像意味着时间的悬置并非小城独有,而是一种能够在墙外的现实社会中找到共鸣的观念。它暗示线性时间观的裂缝是普遍存在的,无时的体验可能潜伏于任何看似稳定的生活常态之下。

在Z镇的图书馆里,摆放着与小城图书馆里几乎一样的老式柴火炉,“千真万确,不是幻影,同那座高墙环围的小城的图书馆里的那只一模一样——抑或说看似一模一样——的火炉”^[5](P196),它们构成了一个超越物理界限的锚点。老式柴火炉的镜像溢出,看上去没有违反墙的规定,却在人的意识中穿透了隔离,当主人公“闭着眼睛,久久地沉浸在对失去的那座小城的幻想之中”时^[5](P200),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共享一个温暖火炉的镜像,使“我的意识在两个世界之间信马由缰地来来往往”^[5](P209)。这就如同在墙的监护下开辟了一条意识越境的通路,让边界变得更具渗透性。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墙是绝对的、不可逾越的,象征着人内心的封闭与孤独不同,《小城》中的边界关系显示出了相对性与流动性,不确定的墙暗示了人们尝试突破自我的藩篱,寻找新的可能性^[10](P43)。

村上春树通过对小城的勾勒,以无影、无书、无时这三重缺失,以及一道充满生命力与意志的高墙,全面解构了现代性依赖的三大基石——身份认同、知识体系和时间观念。他将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巨大的异质性符号,为作品中的异质性人物与事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含隐喻的平台。在平台上,每个细节、每个人物、每个事件,都围绕这三重缺失,与有生命的墙展开一场关于存在、认知与疗愈的深入对话。

二、异质性人物谱系与治愈功能

在小说的第二部,村上春树通过子易先生、主人公“我”与“黄色潜水艇少年”构建了一个功能互补、层次递进的异质性人物谱系。他们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第一部、第三部出现的“读梦”行为,完成

一个从伦理、实践到最终整合的治愈接力。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的异质性,并非自我封闭,而是主动面对创伤,积极找寻解决方案。

老图书馆长子易先生的异质性,体现在他身处现实世界的小镇,却是一个已经死去了的,没有了肉体,意识却仍旧存在的幽灵^[5](P219)。这种存在形态本身,即是对物理和社会常规的颠覆。尽管承受着丧妻丧子的重负,子易先生并没有流露自己的悲伤,而是示范了一种在异质状态下积极找寻生存意义的伦理。他将自己存在的全部意义寄托在守护图书馆事业上,65岁那年,捐献了一座酒厂建筑给镇里当图书馆用,将自己的现金、股票、房产等全部财产捐赠给基金会并由基金会来经营图书馆^[5](P264)。日常生活中,他身穿裹身裙,头戴贝雷帽,手上还戴着一块无指针的手表,奇特的服饰也是对社会性别与时间规范展开的一种仪式性越界,既彰显了个性,也暗示对常规秩序的挑战与质疑。

当“我”向子易先生讲述自己与影子分离,选择留在小城的经历时,他认为“我”是具有强大意志的人,可以凭借自身的意志进入小城,也出于意志返回现实世界。由此判断,“我”可以继承他担任图书馆长,因为图书馆不仅是一个收藏大量图书的公共空间,还是“接纳失去的心灵的特殊场所”^[5](P288)。经过几次深入谈话,子易先生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出发,对“我”说出一番肺腑之言:“切不可失去信任之心。只要能够坚定地深信一件事,前进的道路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明朗起来。”^[5](P289)这也就是告诫,无论陷入怎样的困境,个体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责任与执着,建立起具有继承性与尊严的生活方式。

人物谱系的异质性,在主人公“我”身上另有一番显现。第一部中,“我”深陷于矛盾中:一方面,感觉到外部的现实世界充满冷漠与疏离,自己只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不可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留在这座充满异质色彩的小城之内,却能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5](P132)。最终,“我”决定留在城内,在图书馆解读那些被精心收集保存下来的“旧梦”。这些“旧梦”被明确界定为修筑这座小城时,那些被逐出墙外的本体所留下来的“内心残响”^[5](P109)。在“我”看来,本体被驱逐出墙外,而留下来的内心深处的残骸与创伤,宛如一颗颗被封印的“心的种子”,蕴含着无数未被言说的情感与苦痛。

在小说的第二部,经过与子易先生的深度交谈并接受他的教导之后,“我”的异质性随之发生变化。第三部重返小城,将“读梦”这一行为聚焦于个体所承载的创伤记忆。“读梦人”的角色由此转变为一个系统性的疗愈者,肩负着抚平心灵创伤的重任。“我”通过一种极为细腻的方式,“用手掌温柔地温暖‘旧梦’,将它们引导出硬壳之外”^[5](P476)。这一过程是对“旧梦”的唤醒,更是对其中蕴含的负面情绪与创伤记忆的平息与化解,使那些长期被密封、被压抑的“内心残响”得以释放与疗愈。那些被封存的“旧梦”,恰如精神分析中所言的被压抑的无意识创伤,潜藏在心灵深处,时刻影响着个体的心理状态。“读梦人”的工作,正是通过深度的共情与抚慰,用温暖为这些创伤提供一个被倾听、被唤醒的机会,实现内心的释怀与疗愈。

第三位人物,“黄色潜水艇少年”的异质性,体现为他拥有一种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能力,可以说“接近于神的领域”,但在通常的社会生活能力上却有所欠缺^[5](P414)。这样一种巨大落差,反衬出他是天赋与使命的化身。小说的关键转折在第三部,当少年与主人公“合为一体”的请求得到实现后,治愈的深层逻辑得以显现:单靠主人公的共情与伦理,或单靠少年的天赋,都无法完成治愈。真正的疗愈,必须实现意识与潜意识、理性经验与直觉天赋的协力。小说中,“我”将那些梦唤醒,让它们讲述自己,“然而真正在听取他们声音的,却是那个‘黄色潜水艇少年’”^[5](P475)。两人化为一体后的无缝连接,显示出双方的异质性在各自的潜意识深处达成了和解。

小说结尾,少年觉察到“我”的内心在追求新的变动,想要与墙外的影子合二为一,他一面鼓励“我”听从自己的内心,回到墙外的世界,一面决定自己留在城里,继承“我”的工作。他感觉到那些“旧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他敞开了心怀,“小城也需要我。因为如果没有‘读梦人’,这座小城就无法维持。……小城,还有那道墙,都会配合我而微妙地改变其形状的吧”^[5](P490)。少年欲借助“读梦”深入个体

的认知深处,对规训之墙施加影响乃至实现超越。这种以内向整合推动外向变化的决心和意念,使他化身为连接异质困境与重生希望的媒介。

子易先生、“我”以及“黄色潜水艇少年”这三者,搭建起了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宛如“我”接手子易先生打理图书馆那般,少年也接替我从事“读梦”的工作。在传承链上,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子易先生仿佛一位先行者,以幽灵的身份展示了如何通过坚守责任(守护图书馆)来面对内心创伤,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我”是子易先生的继承者,再次回到“小城”后,通过“读梦”,用耐心和共情去倾听、温暖那些被遗忘的痛苦记忆。“黄色潜水艇少年”则以自己的天赋促成了不同能力的融合,致力于完成治愈的最后一棒。在作品中,这些人物的异质性并不是缺陷,而是展现了抚平“内心残响”这一象征心灵丧失及历史伤痛的过程。

那么,“内心残响”究竟是什么呢?在第一部里,村上春树为读者留下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某天夜晚,“我”陷入一场奇异的梦境之中,它或许是在书库读过的“旧梦”:那是一个遥远的他国发起军事行动的画面。在那儿,“我”带领的一队巡逻兵碰上了一群身着白衣的人,他们没说一句话,没有一丝犹豫,仿佛理所当然一般,一个接一个纵身跳下悬崖。“我”为他们的寡默无言和毫无表情所震撼,不禁自问:“不管是有何种内情,直面自己惨烈的死,竟能够那般冷静自若,无动于衷吗?”^[5](P101)至此,村上春树借助小城与Z镇双重空间的交错,在表面神秘乃至荒诞的情节背后,隐藏了一个沉重的历史潜文本。近年来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为我们理解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深层叙事结构与伦理美学带来了启发。该理论认为,在许多叙事作品中,隐藏着一个与表面情节同步发展的隐性叙事进程。这一进程虽不直接介入情节的展开,但凭借文本中暗藏的意象与象征,承载了作品更深层次的主题内涵,在任何程度上对它的忽略,都会造成对文本意义的片面理解^[11](P63)。从这个视角来看,《小城》无疑是反映这一叙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在表面情节上,故事聚焦于异质性人物的伦理传承以及对“旧梦”的治愈过程。主人公和“黄色潜水艇少年”融为一体,唤醒那些梦境,让它们诉说自身的情感,形成一套针对个体内心创伤整合的完整表达。然而,治愈的指向不限于个人精神层面。当“读梦”被描述为“梦主动地悄然钻出了硬壳之外,发着微光……感知到它们在讲述自己时所产生的极富特征的微妙颤动而已”^[5](P475),这一行为便与处理被集体意识封闭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深刻的同构关系。至此,作品的叙事悄然从心理领域转向历史领域,与深藏于作者村上春树内心的战争记忆形成了紧密的互文关系。村上春树将父辈的战争责任这一沉重的家族异质物,转化为小说叙事背后的驱动力,使显性的治愈仪式在隐性层面升华为一场对历史创伤的文学追忆与伦理担当,小说主题也从个人精神层面提升至民族历史反思的伦理高度。

三、历史承载与异质性的伦理维度

在《小城》出版之前的2020年,村上春树推出了一部自传体随笔《弃猫》。作品从一个看似平淡温馨的童年记忆开始:“我”和父亲去海边遗弃一只怀孕的母猫。然而,这个日常行为立刻被一个异质性事件所打断:被丢弃的猫竟凭借自身力量,先于父子回到了家,并且竖起尾巴亲切地来迎接我们了^[12](P6)。作品的叙事也在“弃猫的记忆”“父亲的生平介绍”“父子之间沉默而紧张的关系”“父亲作为侵华士兵的战争片段”几个不同话题之间切换,其中最核心的异质空间是父亲的沉默。因为村上春树的父亲村上千秋曾是一名侵华士兵,于是那段历史如同沉重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父亲心头。仅有一次,他向作者坦白自己所在的部队杀害一名俘虏的场景。据他父亲讲述,那名士兵始终闭着眼睛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丝毫慌乱与惊恐。

父亲几乎没有对人讲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无论是亲自动手,还是仅仅在一旁目睹,那恐怕都是他不愿回忆,也不想提及的过去吧。^[12](P46)

在上一节里,曾提到“我”在梦中看见自己身为士兵与一群白衣人相遇的战争画面,将那段描述和《弃猫》的此段回忆放在一起,可以看到村上春树把家族记忆转化为文学意象的心理与创作过程,这也是艺术加工之后的伦理诘问。两段文字的核心是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沉默,《弃猫》中的中国士兵从容就义属于一种个人记忆,《小城》中白衣人集体跳崖形象则是被抽象强化,这种从个人到群体的转化揭示了村上春树的心理代入与伦理困境。在《弃猫》中,“我”是被动的倾听者,而在《小城》的梦境里,“我”却成为亲历者。通过这一视角的转变,村上春树将家族异质物加工成一种文学装置,把父亲的创伤记忆变成可公开解读的文学客体,从自身主观的角度去体验父辈的困惑与罪恶感。白衣人跳崖梦境又连接了小说的内与外,让叙述者“我”和读者一起面对历史的痛苦与尊严。在《弃猫》结尾处,村上春树写道:

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寂寂无名的一滴。是确实存在的,却也是可以
被替代的一滴。但这一滴雨水中,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将这
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12](P88)

这句话意味深长,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为子辈,村上春树深刻意识到自己无法也不应继承父亲的个人罪责,因为那是父亲个人的选择与经历。然而,他却必须继承由父辈传递下来的历史,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忆,更是整个日本民族的记忆与教训。这种继承是一种对历史的正视与反思。

父亲忆起的用军刀斩断人脖子的残忍场面,毫无疑问在幼小的我心里烙下了鲜明的伤痕
……多年来压在父亲心中的沉重往事——借用当代词汇形容,就是“心理创伤”——部分地由
我这个做儿子的继承了下来。所谓心与心的连结就是这样,所谓的历史也就是如此。^[12](P45)

村上春树的这段剖白,为其文学创作中的异质性书写提供了深层心理动因与伦理坐标,揭示了他个人记忆中那个无法被同化的异质物——父辈的战争罪责与暴力历史。他将个人创伤与历史叙事置于一个连续的谱系之中,既未割裂个人与历史的纽带,也未陷入简单的罪责继承,而是通过“心与心的连结”这一具身化隐喻,将历史转化为一种代际传递的、有待处理的“沉重往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城》无疑是对《弃猫》里的历史追问做了一次文学升华。

村上春树将个人对战争罪责的具体探寻,提升为对整个社会历史记忆机制的隐喻性批判。在《小城》中,主人公发现这里的居民对某个导致“聚变”的关键历史节点,无论是战争、瘟疫还是变革都产生了集体失忆。他们“从来不提那个‘什么’”^[15](P55),并非出于回避,而是仿佛记忆本身已被彻底剥夺。这种记忆的攫走与居民们的无影仿佛硬币的两面:失去影子,意味着失去了在时间中确认“我是谁”的纵向坐标;失去历史记忆,则意味着切断了“我们从何而来”的集体根源。因此,小城居民的沉默,并非个人选择,而是一种系统性地被沉默。村上春树在此处呈现出对现实的文学审视,披露了一种比否定更深层的历史困局,即全社会对于自身过往陷入了一种无法探寻、难以察觉的静默状态。正如郑季文所论,村上春树在这里展现出了现代日本人遭遇到的历史记忆割裂难题^[13](P102)。

要理解这种历史虚无感的现实根源,必须将《小城》与《弃猫》对读。两部作品的互文,揭示了日本民族集体记忆中被刻意剥离、却又必须寻回的历史真相,尤其是侵略战争这一核心异质物。《小城》第一部里,一位老人的话语生动描述了这种记忆情形:居民们对宏大的往昔几乎没有印象,却存留着极不连贯的个人片段。老人敏锐地质疑,这些记忆或许被“捏造得于小城有利”^[15](P57)。村上春树的这段描述,实际上也是战后日本社会历史认知的文学投影,即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集体缄默,只残存一些经筛选、无害化的个体碎片。这种情况和《弃猫》中村上春树从父亲那里部分继承的、变形且断续的创伤记忆完全同构,显现了历史是怎样在代际以一种不完整却难以挣脱的方式传递的。

回顾村上春树的创作历程,追问历史记忆始终是一条核心线索。刘研的研究表明,村上春树是一位

通过独特的文学世界探寻日本未来出路和日本人生存意义的作家,他对自身国家的历史认识表现出了复杂的情感焦虑。自1995年《奇鸟行状录》中对战争记忆代际传承的困惑^[14](P166),到2009年《1Q84》提出“历史就是集体记忆”的观点,他不断思考:一旦集体记忆遭到剥夺或篡改,个体与民族又该如何维持“正当的人格”?^[15](P323)那么,面对记忆的消逝,人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小城》可以说是对这一议题的集大成式文学回应。书中构建的“读梦”职业,实质上是一项面向历史记忆的修复工程。它所处理的“旧梦”,直接指向那些被收在密封容器里,藏进图书馆的深处,禁止普通居民接近的“内心残响”^[15](P110)。因此,“读梦人”的职责——借助共情来“平复、消解”这些残响——已超越个体心理疗愈层面,上升为一种对扭曲的集体记忆进行文学性挖掘、聆听与整合的伦理行为。在笔者看来,这一书写象征着村上春树创作的深化,即从早期作品中展现记忆的迷失与迷茫(《奇鸟行状录》),到中期探讨记忆的作用与危机(《1Q84》),最终通过《弃猫》的内在探索,在《小城》中确立了“读梦”这样一套处理记忆的方法体系与实践路径。从另一视角来看,村上春树将对战争责任这一异质存在的不断追问,锤炼为一套独特的、用以直面历史、承载记忆的文学叙事框架。就此意义而言,《小城》可以说是村上春树创作历程中,将历史省思、伦理担当与文学形式融合得较为全面且自觉的一次尝试。

四、结 语

2023年4月27日,也就是在《小城》出版的两个星期后,村上春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做了一场针对该作品的演讲,题为《在瘟疫与战争时代写小说》,探讨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意义。村上春树认为,就像国家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屏障一样,人和人之间也默默筑起了一堵堵墙,个人内心更像《小城》里“我”与影子那样发生了分裂。针对这种分裂的社会现状,他着重指出需要花费时间思索如何消除对立与分裂,并期待小说和故事能够为此提供思考的力量^[16](P118)。

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驱动他在《小城》中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叙事体系,从空间、人物与历史记忆三个维度展开。在空间上,通过无影、无书、无时的先验法则,创造了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其存续依赖于拟人化、自主的墙,这是历史认知的规训和边界,而火炉、无指针钟表等镜像叙事则在现实与异界的隔绝中开辟了意识渗透的通道。在这样的异质空间里,活跃的不再是传统的典型人物,而是承载特定治愈功能的异质性人物。子易先生作为幽灵馆长,示范了以责任治愈创伤的伦理姿态;“我”作为“读梦人”,发展了用共情来温暖“旧梦”的实践技术;“黄色潜水艇少年”则以其天赋完成了理性与直觉的最终整合。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应对历史创伤的功能装置。在历史记忆上,作品中的“旧梦”,是那些被墙这样的主流叙事驱逐的,带有战争创伤的“内心残响”,而“读梦”这一核心行为,则实现了从个体疗愈到集体记忆修复的意义转换,整部小说成为对日本战后集体性记忆缺失、篡改的隐喻和批判,也是村上春树对《弃猫》中父辈罪责记忆的一次系统性文学承载与转写。

林敏洁认为,村上春树文学致力于战争记忆的相关创作,直面战争中的人性挣扎,引导读者重温历史,并通过战争记忆呼唤和平友好,这些既源于正确的历史认知,也渗透于文本,凸显了富有深意的文学本原^[17](P198)。也正是基于正确的历史认知,村上春树对战前战后的日本社会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反思,当日本社会对过去的战争显示沉默时,他用小说击穿了这种荒诞,指出战争记忆在当代日本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从他整个文学生涯来看,《小城》反映了他的创作从揭露问题向提供方法的转变,是他将历史反思彻底形式化、系统化的一部作品。通过小城这一异质空间的寓言,村上春树既完成了对现代性认同与历史叙事的双重质疑,也以独特的“读梦”书写,构建了一套处理历史创伤的文学方法论,尝试为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及其困境开辟一条文学救赎与疗愈之路。村上春树以他的文学感性,将那道横亘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从沉默到灵动的墙,十分清晰地矗立在读者面前,期待读者作出自己的回应。当异质性书写从风格标识演变为伦理装置时^[18](P18),村上春树文学已不再是疏离的美学,从当年的“且听风吟”到这道“不确定性的墙”,它已经演化为一座直面历史的桥梁。

参考文献

- [1] 林少华. 文体的翻译和翻译的文体.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9, (1).
- [2] 佐藤憲一. 村上春樹とアメリカ再考: 村上春樹 / Haruki Murakami の現在地. 文学研究論集, 2015, (33).
- [3] 王守仁. 异质性与融通性: 谈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外国文学研究, 2025, (5).
- [4] 张锦. “命名、表征与抗议”——福柯的“异托邦”与“文学异托邦”. 外国文学, 2018, (1).
- [5] 村上春树.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 施小炜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
- [6] 张容南. 关于现代自我认同的争论——泰勒与福柯、哈贝马斯之争. 哲学研究, 2020, (6).
- [7] 肖炜静. 反抗、收编与互融——“异质性”空间与文化霸权及资本逻辑的辩证关系.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
- [8] 村上春树.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林少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
- [9]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杂文集——无比芜杂的心绪. 施小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
- [10] 李敏, 张帅. 从隔绝到重生: 村上春树小说中“墙”的意象变迁.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
- [11] 申丹.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12] 村上春树. 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 烨伊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21.
- [13] 郑季文. 危机时代的生存哲学:《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的创作范式与时代隐喻. 当代外国文学, 2025, (4).
- [14] 刘研. 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5] 村上春树. 1Q84 BOOK 1 (4月-6月). 施小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
- [16] 村上春樹. 疫病と戦争の時代に小説を書くこと. 新潮, 2023, (7).
- [17] 林敏洁. 村上春树文学与历史认知——以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为中心. 当代作家评论, 2017, (3).
- [18] 李俄宪. 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Space, Characters and Historical Memory

On the Heterogeneous Writing and Healing Nature of Haruki Murakami's

The City and Its Uncertainty Walls

Xu Gupeng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Haruki Murakami's *The City and Its Uncertainty Walls* marks a deepening and culmination of his lifelong literary preoccupation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heterogeneity, a fully-fledged system constructed in the novel along three dimensions of space, characters, and historical memory. The novel depicts a small city ruled by a logic of systemic absences — the absence of shadows, books, and time — and policed by a towering wall endowed with its own subjectivity and vitality, with an array of heterogeneous beings, including ghosts, dream-readers and supernaturally gifted teenagers. Beneath the overt narrative of personal healing through "dream reading" lies an implicit reckoning with war, histor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guilt. The work enters into intertextual dialogue with the family war memories Murakami unfolded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essay *Abandoning A Cat*, jointly elevating heterogeneity from mere formal innovation to a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and responsible bearing of history as a grand, weighty heterogeneous reality. The heterogeneity in Murakami's fiction thereby evolves from an early stylistic marker into a methodology for negotiat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

Key words Haruki Murakami; *The City and Its Uncertainty Walls*; *Abandoning A Cat*; healing

■ 作者简介 徐谷芑, 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江苏 南京 211166。

■ 责任编辑 何坤翁